

Spring 2013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March No.20

2013年3月 第二十期



##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第 20 期  
2013 年 3 月

主编：郭棲庆 赵宗锋  
编辑：王惠英  
设计：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  
电话：86-10-88813845  
传真：86-10-88813842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100089

### 出版人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 编委会顾问

王恩哥 北京大学校长  
陈吉宁 清华大学校长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杨玉良 复旦大学校长  
龚 克 南开大学校长  
杨学义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苏志武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程 伟 辽宁大学校长  
朴永浩 延边大学校长  
金德水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Mai Trong Nhuan 越南国立大学校长  
Pirom Kamol-Ratanaku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校长  
Khlol Thyda 柬埔寨皇家学院院长  
Soukkongseng Saignaleuth 老挝国立大学校长  
Tserensodnom Gantso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理事长  
Tin Tun 缅甸仰光大学校长

### 编辑委员会

吴志攀 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王孙禺 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周云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光耀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 龙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丁俊杰 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荣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金强一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罗卫东 浙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Bouadam Sengkhambout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ho Kaung 缅甸仰光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Prapin Manomaivibool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Chimed Ganzorig 蒙古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Sum Chhum Bun 柬埔寨皇家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Nguyen Thi Anh Thu 越南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  
郭棲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兼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副主任  
赵宗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执行副主任

# CONTENTS

## 目录



### P.02

→ “2013年1月5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第十届亚洲传媒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本届论坛以“悟·现实：超越想象的传媒”为主题。



### P.04

→ 在高度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形象益发显现出重要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国家安全价值等。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经贸关系。

## 特稿

02 第十届亚洲传媒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

## 研究进展

04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明镜》周刊（2000 - 2010年）和《时代》周报（2000 - 2010年）

19 斯里兰卡国家利益考量中的中美权重初步分析

24 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文献综述

## 学者与著作

36 《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 - 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



丁俊杰



朴仁国

## 第十届亚洲传媒论坛 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

2013年1月5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的第十届亚洲传媒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本届论坛以“悟·现实:超越想象的传媒”为主题,邀请到韩国、泰国、菲律宾、日本等国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媒体精英,就未来传媒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讨和交流。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廖祥忠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中国传媒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友谊与合作已走过十年历程,期间双方在促进亚洲传媒学术的发展与繁荣方面成绩卓著。同时,廖祥忠副校长对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十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亚洲传

媒研究中心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合作中产生了很好的协同效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学校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该中心的建设,期待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在学校协同创新平台层面取得更好成绩。

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教授对论坛主题做了进一步阐释。他表示,当前的媒体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希望与会专家学者、业界领袖立足现实,通过亚洲传媒论坛这个学术交流平台,不断取得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导向意义的成果。

本届论坛紧密结合2012年中国传媒产业整

体发展态势，以“无缝时代——社交网络媒体的创新发展与应用”、“无边界时代——传媒产业的新格局与未来走向”、“无中心时代——媒体的社会驱动”、“无所不在时代——移动为我们带来什么”四大议题，充分调动业界精英和专家学者的学术兴趣和想象力，共同思考传媒的未来发展之路。

DCCI 互联网数据中心创始人、总裁胡延平发表主旨演讲，他从新媒体时代的七个临界点展开分析，指出“一个大道无形的媒体时代已经来临，要想悟出未来超越想象的传媒形态，需要往传感的方向看，往数据的方向看，往开放网络的方向看”。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沈浩总结了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个重要变化：大众媒体过渡到数字媒体、技术从单一的存在向重塑社会和文化价值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线性向非线性转变。

韩国忠北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韩光接从技术、媒体行业、媒体使用环境、付费方式四个方面的变化，分析了在数字、网络时代我们所处的媒体生态环境，以及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化。他指出，不管媒介的手段多么日新月异，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从业者的思想、眼光和见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詹新惠深入分析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在渠道、内容和互动三个方面的特征，她认为，在新媒体时代，社会并非无中心，而是中心多极化、中心多变化以及泛中心化，传统媒体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并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未来的传媒可能是由职业的媒体人、专业的报道内容和新媒体的传播平台构成。

韩国国会议员尹永硕在发言中描述了智能生活、智能经济、移动工作的未来图景，指出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整个社会智能时代的到来。

亚洲传媒论坛自 2003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九届。迄今为止，亚洲传媒论坛累计邀请了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多位政府机构领导人、传媒领袖、知名学者和业界精英参加，已跻身亚洲区域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传媒论坛之一，为构建亚洲传媒研究的资源网络、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文转载自：

<http://news.cuc.edu.cn/article/27712/>



##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sup>1</sup>

——《明镜》周刊（2000-2010年）和《时代》周报（2000-2010年）

周海霞 /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 一、选题依据

在高度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形象益发显现出重要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国家安全价值等。国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外交经贸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尤其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行

动能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普遍流行中国威胁论，中国被视作来自另一个阵营的潜在威胁，无论是中国的国内事务还是国际事务都被西方主流话语置于威胁论的框架中进行解读。不仅如此，其他国家的特定发展状况也与中国威胁论挂钩，比如德国的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甚至奶制品价格上涨，很多言论都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成果。

将之归咎于中国。2008年西藏发生动乱事件后,批评指责中国的西方舆论如潮涌般集中爆发,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有组织的阻扰火炬传递的抗议活动。在经济危机语境中,中国率先走出危机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这使得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进一步升级,西方担心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会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于是原先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上升为体制威胁论。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在西方社会的主导形象是负面的,中国在德国同样主要呈现负面形象。根据美国“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皮尤全球态度项目调研结果,德国公众对中国所持的看法相当消极,2007年至2011年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德国人比率分别高达54%(2007)、68%(2008)、63%(2009)、61%(2010)、59%(2011);从世界范围看,2007年至2011年只有日本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每年都比德国公众更为负面。<sup>1</sup>西方其他民调机构如“环球扫描”(Globe Scan)、“世界公众舆论网”(World

Public Opinion.org)等进行的国家形象调研项目也都得出类似结果。<sup>2</sup>2012年上述民调机构得到的关于对华持负面态度的德国人所占比例的数据有所差异,其中“皮尤中心”得出的数据为67%(持正面态度者比例为29%),<sup>3</sup>而“环球扫描”得到的数据则为47%(持正面态度者比例为42%)。<sup>4</sup>中国在德国公众眼中的负面形象自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突出反映为德国国内对中国的恐惧情绪,这种恐惧情绪在德国精英阶层的舆论中也成为关注主题,比如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在2012年科隆经济论坛上致开幕词时表示:“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利益来视中国为伙伴,无需兴奋,也无需畏惧。”<sup>5</sup>德国记者弗朗克·西伦以这种恐惧情绪为主题的新作《对中国的恐惧:新的世界大国如何利用我们的危机》<sup>6</sup>在德国成为畅销书。

西方社会以文字形式塑造中国形象主要有两个渠道,其一是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其二是西方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对于西方公众而言,后

者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如今的社会已经成为媒体社会,媒体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大众媒体具有交际、再创造和传播功能,而媒体使用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媒体也是德国民众获悉和接受中国形象的最重要途径。关于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领域,随着形象学引入中国,国内学界对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也出现了由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是否符合中国的真实情况),向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的转变(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的集体无意识的印象),即由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客观反映,转变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反映西方文化的表述,<sup>7</sup>这种转变相当于由现实主义向建构主义视角的哲学转向。这种转变对于研究西方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领域也引入了建构主义视角,“大众传媒对社会现实日复一日的描述,影响着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媒体通过选择新闻事

1 Pew Research Center, "China Seen Overtaking U.S. as Global Superpower", 2011, <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apter-4-views-of-china/>.

2 马凌、李昱佳:《2009年全球舆论调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卷第3期。

3 参见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Opinion of Obama Slips, International Policies Faulted", 2012, <http://www.pewglobal.org/2011/07/13/chapter-4-views-of-china/>.

4 参见 GlobeScan, "Views of Europe Slide Sharply in Global Poll, while Views of China Improve", 2012, [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2\\_country\\_ratings/2012\\_bbc\\_country%20rating%20final%20080512.pdf](http://www.globescan.com/images/images/pressreleases/bbc2012_country_ratings/2012_bbc_country%20rating%20final%20080512.pdf).

5 【德】施明贤:《龙腾虎跃之地——未来对华经济关系的挑战和机遇》, [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_\\_pr/2012/reden-bo-2012/120329-k\\_C3\\_B6ln-ps.html](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zh/__pr/2012/reden-bo-2012/120329-k_C3_B6ln-ps.html).

6 Sieren, Frank, *Angst vor China: Wie die neue Weltmacht unsere Krise nutzt*. Berlin, 2011.

7 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实形成媒介议题，使某些事实从无数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从而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问题重要性的认识”。<sup>1</sup>

德媒涉华报道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以负面倾向为主基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德国媒体中继续呈现负面形象，中国经济威胁论产生各种变体，如中国能源资源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资本威胁论等。近年来德媒涉华报道的负面倾向也反映在中国公共舆论中，无论是中国官方还是普通公众，无论是学术研究结果还是个体的感性认识，所得到的结论都指向德媒的负面报道倾向。中国公共舆论指责德媒涉华报道过于负面和片面，导致中国国家形象受损，但德国媒体和德国政界并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他们一再以德国媒体向来具有批判性为由，驳斥中方所提出的关于德媒涉华报道具有反华倾向的观点。德媒坚持表示其涉华报道并无倾向性，但实际上德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并非如其媒体所宣扬的那样是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反映，而是由德国媒体积极建构的关于中国的认识。德国媒体被视为国家的第四种权力，表面上是独立于其他三权之外的具有监

**德国媒体被视为国家的第四种权力，表面上是独立于其他三权之外的具有监督功能的机制，在公众面前向来披着“客观中立”的外衣，因而德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德国公众那里获得“客观性”地位，被认为是对中国真实情况的镜像反映。**

督功能的机制，在公众面前向来披着“客观中立”的外衣，因而德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德国公众那里获得“客观性”地位，被认为是对中国真实情况的镜像反映。德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内容选择和报道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德国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其实中国有很多面，而缺乏直接信息来源的德国民众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是由德国媒体从众多的面中筛选出来的，是德国媒体为公众做出的预先选择的产物，并非对于真实中国的反映。这正是本研究的关键切入点。本文旨在揭示德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建构性，德媒眼中的中国形象其实更多地反映德国/西方自身的诉求和欲望，而非真实的中国。在“中

国威胁论”主导西方中国形象的背景下，这种研究视角对于积极影响中国国家形象、捍卫中国的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德国大众传媒又是反映德国民众和各团体（如德国企业界、政界、学术界等）对于中国的态度与看法的重要基地。所以研究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对于把握德国各界对中国的态度、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国家部门也可以及时调整或制定涉德应对策略。”

## 二、研究现状

### （一）中国形象研究的一般情况

国家形象研究是从战争中孕育出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发人们对于国家形象问题的关注。<sup>2</sup>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阿富汗战争，国家形象的问题始终备受关注，<sup>3</sup>可以说，国家形象研究是应实际需要诞生的。我国的国家形象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sup>4</sup>该研究在国内的兴起同样与国家形象对于中国国家地位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有关。回顾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发展，李希光等于1996年出版的著作《妖魔化中国的背后》<sup>5</sup>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很多学者都表示，

1 张咏华、殷玉倩：《框架建构理论透视下的国外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以英国〈卫报〉2005年关于中国的报道为分析样本》，载《新闻记者》2006年第8期。

2 刘继南、周积华、段鹏：《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3 同上，第275页。

4 何辉、刘朋：《新传媒环境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前言”，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

5 李希光、【美】刘康：《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虽然该书的观点存在争议，但却推动了学术界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sup>1</sup>从那以后（尤其是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深受国内学术界关注，有学者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形象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显学。<sup>2</sup>近几年中国形象研究更是成为学术研究热点，这从涉及中国形象的期刊论文数量呈现急速上升趋势可见。笔者以“中国形象”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刊网2000-2011年间所有的论文，发现相关论文数量从2006年起大幅增加：从2000年的22篇，增长至2005年的59篇和2006年的80篇；2007年则已达到143篇，2008年213篇，2010年的相关论文数量最多，为293篇。

国内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文献基本可以分为理论与实证研究两大类，也有些著作兼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主要注重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视角出发，对国家形象的定义、特点、与国际传播的关系以及如何建构良好的国家形象等方面进行阐释，笔者此处仅举其要者。梳理相关文献后发现，中国国

内关于国家形象理论的研究日趋成熟，并且呈现多视角性特点。在著作类文献中，较早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刘继南等的研究成果，其中《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国际关系的新视角》被视作国内第一部将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理论著作。<sup>3</sup>国家形象研究领域的另一部较早的理论著作是管文虎主编的《国家形象论》，该书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建树为指导，深刻总结旧中国衰落形象的历史教训，讴歌建国5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形象发生的巨大变化。<sup>4</sup>关于国家形象理论研究的著作中较有影响的还包括张昆著《国家形象传播》，该书着重从中国对外宣传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讨论新世纪中国对外宣传与传播的战略和策略问题。<sup>5</sup>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对外传播的著作呈现多视角性，比如刘明著《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结合时代潮流和国际形势的特点概括当代中国形象的核心要素，并相应就如何定位和构建精致化中国形象进行探讨；<sup>6</sup>周

明伟主编的《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则兼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该丛书上部主要从理论上阐述国家形象定位和构建渠道，下部则侧重实证分析，阐述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以及报告中国形象境外公众调查分析；<sup>7</sup>段鹏著《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结合西方的中国形象特点，就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传播策略提出建议；<sup>8</sup>吴友富著《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提出解构“中国威胁形象”，并从政府公关、对外文化传播、品牌形象塑造、<sup>9</sup>媒体传播和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研究国家形象塑造；胡晓明著《国家形象》结合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历程的分析和未来展望，探索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特点和规律，并提出相关建议；<sup>10</sup>何辉和刘朋等著《新传媒环境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着重研究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环境中的国家形象传播。<sup>11</sup>此外，近年来也有著作结合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理论阐述中国形象的对外传播，如李智著《中国国家形象：全

1 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3 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第2页。

4 管文虎：《国家形象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

5 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刘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7 周明伟：《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论丛》，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

8 段鹏：《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传播策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绪论”第2页。

9 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 胡晓明：《国家形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 何辉、刘朋：《新传媒环境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年。

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从国际关系领域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出发,既论述了近现代和当代中国形象,又提出了全球传播时代下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策略建议;<sup>1</sup>李正国著《国家形象建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论述国家形象建构战略;<sup>2</sup>丁磊著《国家形象及其对国家间行为的影响》以权力和形象为主线,研究国家形象与国家间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sup>3</sup>

在国内关于国家形象的理论研究中,除了著作类成果以外,本世纪初论及国家形象定义的一些期刊论文也具有重要价值,比如李寿源<sup>4</sup>、杨伟芬<sup>5</sup>、孙有中<sup>6</sup>、汤光鸿<sup>7</sup>等的论文。关于国家形象概念的界定对该领域的整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形象的实证类研究成果主要涉及中国在境外所呈现的形象,其中又以关于西方国家中的中国形象研究成果居多。从观察对象的切入点

看,此类研究基本可以分为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两大类。其中比较文学领域的成果主要以形象学的“他者理论”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理论根基,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尤其注重历史中国形象研究。该领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周宁,从1999年起周宁撰写或者主编的中国形象系列丛书在学界引发重要影响,比如其在2004年所推出的共包含8卷的丛书《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sup>8</sup>,2010年周宁又主编推出了包含8卷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sup>9</sup>。该领域另一位成果丰富的作者是姜智芹,其主要著作都以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对象,比如《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sup>10</sup>、《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sup>11</sup>等。本研究属于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

象研究领域,因此对于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予详细梳理。

在关于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实证研究方面,刘继南等的成果也较有代表性,其著作《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分别对世界主流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媒体、主流影视中的中国形象等进行分析;<sup>12</sup>著作《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分别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主流印刷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分析。<sup>13</sup>从所研究媒体语料来源的国别看,以美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为研究主题的著作和论文较多,比如潘志高著《〈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sup>14</sup>和何英著《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sup>15</sup>、乔木著《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sup>16</sup>、孙有中著《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

- 1 李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时代建构主义的解读》,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
- 2 李正国:《国家形象构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 3 丁磊:《国家形象及其对国家间行为的影响》,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 4 李寿源主编:《国际关系与中国外交——大众传播的独特风景线》,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
- 5 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
- 6 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3期。
- 7 汤光鸿:《论国家形象》,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
- 8 周宁著并编注,《契丹传奇》,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 9 周宁:《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 10 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 11 姜智芹:《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 12 刘继南、何辉:《中国形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 13 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 14 潘志高:《〈纽约时报〉上的中国形象:政治、历史及文化成因》,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5 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
- 16 乔木:《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

2002)》<sup>1</sup>、杨松芳著《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建构》<sup>2</sup>等。研究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著作数量较少,其中包括如张宁著《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sup>3</sup>、刘林利著《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sup>4</sup>、张光军著《韩国媒体的中国观及其语言特点》<sup>5</sup>等。根据中国期刊网的搜索结果,相关期刊论文中同样以研究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居多,也包括少量分析日本媒体、英国媒体、德国媒体、韩国媒体、阿拉伯媒体等境外媒体涉华报道的论文。

(二)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综述(德国)

德国已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从分析方法看,以内容分析法居多;从数量上看相关成果主要集中在2008年以后,这与2008年中国发生汶川地震、“3.14”事件、主办奥运会等重大事件有关。2008年作为奥运会东道主的中国备受世界瞩目,德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中也多以2008年德媒涉华报道为分析语料。

从时间上看,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国内已经出现研究德国媒体

**德媒中的中国形象扭曲,德媒涉华报道存在一定缺陷,比如缺少背景信息,报道中充斥大量的套话,且具有极端的善良/邪恶二分框架特征。**

中的中国形象的成果,但是在2000年之前此类成果数量极少,且分析素材的选择都带有一定的中国时代烙印。开启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先河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国——德国媒体的童话之国》。该书作者对11家德国报刊和3家瑞士报刊在1966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间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在德国媒体中呈现的形象是德国现有社会的潜在敌人。<sup>6</sup>

1978年出版的《中国外交政策诸方面——以其在特定德国报纸中的感知为关注重点》一书主要关注德媒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报道,该书作者对

6家德国媒体在1963年至1972年间重点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报道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为:德媒中的中国形象扭曲,德媒涉华报道存在一定缺陷,比如缺少背景信息,报道中充斥大量的套话,且具有极端的善良/邪恶二分框架特征。<sup>7</sup>

与分析一家或多家德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常用方式不同,1989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改革时期的报道——〈世界报〉记者赫伯特·克雷姆普1977—1981年间的北京报道》一书以同一位记者的报道为分析素材。该书对赫伯特·克雷姆普(Herbert Klemp)在选定时间段内的700余篇报道进行分析,并辅以专家访谈法配合研究。作者表示,克雷姆普的报道在文风上呈现多样化,表达精确,细微之处见观察功夫。此外,该文内容还涉及到外国驻华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sup>8</sup>

20世纪末时又分别出现了两个相关研究成果,一个是硕士论文《变迁中的中国形象:德国媒体报道》,该文旨在分析历史和政治背景下德媒涉华报道的变迁。作者选取《法兰克福汇报》、《法兰克福评论报》、《帕骚新闻

1 孙有中:《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2 杨松芳:《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建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 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刘林利:《日本大众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5 张光军:《韩国媒体的中国观及其语言特点》,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年。

6 Amendt, Günter, *China. Der deutschen Presse Märchenland*. Berlin, 1968.

7 Behrens, Wolfhard Karl Wilhelm, *Aspekte chinesischer Außenpolitik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Perception in ausgewählten deutschen Zeitungen*. Bonn, 1978.

8 Frahne, Gerd, *Berichte über Chinas Reformperiode. Die Peking-Reporte des WELT-Korrespondenten Herbert Kremp 1977—1981*. Bochum, 1989.

报》、《斯图加特报道》、《莱茵河周报》、《时代》等6家媒体在1984年、1990年、1996年三年间的涉华报道为分析语料，以定性和定量的内容分析为方法，得出结论：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发生巨大变化，从80年代“中国热”框架下的有趣的新伙伴形象，变成具有威胁性的饥饿巨人形象，从80年代热衷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变成自信的、由继承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教条政府执政的、西方在其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的中国形象。<sup>1</sup>

20世纪末的另一个相关研究成果为期刊论文《新的“邪恶帝国”？德国媒体1949年和1999年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该文通过对1949年和1999年德媒涉华报道的对比分析，揭示中国媒介形象的负面发展趋势：1999年的涉华报道充满“批评和审判”，报道倾向以负面为主；而1949年的涉华报道则显现出德媒对中国基本不感兴趣。<sup>2</sup>

从研究成果的影响看，目前在德国出版的研究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著作中，影响最大、也是调研规模最大的成果，当属由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德国媒体中的



中国报道》。该书基于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日报》、《明镜》、《焦点》、《时代》等6家平面媒体和其他3家德国电视台在2008年的8766条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并采访了相关媒体的驻华记者。该文得到的结论主要包括：德媒涉华报道中充斥着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刻板印象；在涉华报道中负面事件具有高度的新闻价值；涉华政治报道呈现出意识形态烙印和民族中心主义烙印。<sup>3</sup>该书最后还附有凯·哈费茨(Kai Hafez)的评论文章《从传播学视角看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sup>4</sup>、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

的评论文章《从政治学视角看中国形象和媒体报道》<sup>5</sup>，两篇评论分别从传播学视角和政治学视角对德媒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并且都不同程度地论证了《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一书的相关结论。

以2008年德媒涉华报道为分析语料的其他研究成果着重事件报道分析，且多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的分析方法。其中《2008年德国报道中的中国：一个多维视角的内容分析》一书以定量的内容分析和专题研究(【德Themenzyklus】)为方法，就《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和《世界报》中关于西藏动乱事件、汶川地震和奥

1 Hilsmann, Christiane, *Chinabild im Wandel. Die Berichterstattung der deutschen Presse*. Hamburg, 1997.

2 Trampedach, Tim, Das neue, "Reich des Bösen"?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in deutschen Medien 1949 und 1999. In: *Berliner Chinahefte*, 2000, Nr. 18. S. 3-10.

3 Richter, Carola/Gebauer, Sebastian, *Die China-Berichterstattungen in den deutschen Medien*. Berlin, 2010.

4 Hafez, Kai, Das Chinabild deutscher Medien aus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icher Perspektive, 2010. Richter, Carola/Gebauer, Sebastian, *Die China-Berichterstattungen in den deutschen Medien*. Berlin, S. 237-258, 2010.

5 Heberer, Thomas, Chinabild und Medienberichterstattung aus politikwissenschaftlicher Perspektive, 2010. In: Richter, Carola/Gebauer, Sebastian, *Die China-Berichterstattungen in den deutschen Medien*. Berlin, S. 259-288, 2010. S. 259-288.

运会的报道进行分析。作者得出结论：2008年德媒涉华报道具有负面中心倾向、政治中心倾向、危机事件成为报道焦点等特点。同时该书表示，不可笼统指责德媒涉华报道过于负面和片面，而应有差异性地去观察国际报道，媒体报道因事件本身、事件阶段和媒介不同而异；<sup>1</sup>涉及2008年德媒涉华报道的更多研究成果则主要围绕奥运会主题进行，包括奥运前的报道分析、奥运期间的报道分析等。其中《2008年奥运会——在西藏的阴影下？对特定的跨地区德国日报中关于中国主办奥运会的前期报道的分析》一书，对《日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在2008年1月1日至5月31日期间的201篇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称，奥运前期有关的涉华报道受到西藏事件的影响，具有政治框架特点和批判性特点；<sup>2</sup>《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关于特定的跨地区德国日报在2008年奥运会前期准备与赛事举办语境下的内容分析》一书以《日报》和《世界报》的涉华报道为语料，分析奥运会背景下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和评价中国的，以及分析奥

运会的相关事宜是否对中国的媒介形象产生影响。该书主要关注报道出现的主题、行为主体以及关于中国的倾向性评价；<sup>3</sup>《北京——中国的政治游戏：以〈法兰克福汇报〉为例看中国的政治格局对2008年奥运会报道的影响》一书着重分析中国的政策与相关政策对奥运会产生的作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涉奥体育报道。作者考察关于奥运会的报道在哪些地方同时也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国家的报道，也考察东西方之间的政治文化紧张局势在体育领域对奥运会产生何种影响，考察西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媒体影响中国领导人，以及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奥运会保障自身的政治利益。分析结果显示，在奥运举办期间体育报道所占分量更重，在奥运前后政治报道所占分量更重，但同时也并未导致体育报道边缘化；<sup>4</sup>期刊论文《奥运之火在燃烧，随之一同燃起的是怀疑的火焰》对《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世界报》、《明镜》、《焦点》和《时代》在2008年8月8日至25日（即奥运会举办期间）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作者认为，20世纪

90年代以来德媒涉华报道明显的负面倾向在2008年西藏动乱事件报道中得到加强。虽然德国媒体有驻华记者，但是在关于奥运会的报道中依然大量存在与中国形象有关的既有图式；报道呈现的基本都是在德国已存在的关于中国的设想图景，只是被用于呈现这种图景的观察对象发生了变化。<sup>5</sup>

除了单独分析德媒涉华报道，以获悉中国形象建构外，也有个别研究成果通过将中德两国媒体关于奥运会的报道进行对比，以分析获得两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其相关报道模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奥运会报道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使用量化的内容分析方法，对比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中国媒体《中国日报》、《上海日报》2008年6月1日至8月31日间关于奥运会的报道，并采访相关媒体的记者，以求基于对比方式得出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形象。在该书中关于中国的形象、刻板印象和偏见成为分析重点。根据该书分析结果，德国媒体涉华报道聚焦冲突主题，塑造过于负面的中国形象，视西方国家优越于中国，中国更

1 Bieber, Linny, *China in der deutschen Berichterstattung 2008: Eine multiperspektivische Inhaltsanalyse*. Wiesbaden, 2011.

2 Vach, Ina, *Die Olympischen Spiele 2008 – im Schatten von Tibet? Eine Analyse der Vorberichterstattung über die Olympischen Spiele im Gastgeberland China in ausgewählten deutschen überregionalen Tageszeitungen*, Hannover, 2008.

3 Pfeifer, Susanne, *Das Image Chinas in den deutschen Medien. Eine Inhaltsanalyse ausgewählter überregionaler deutscher Tageszeitungen im Kontext der Vorbereitung und Austragung der Olympischen Spiele 2008*, Saarbrücken, 2009.

4 Geuenich, Bettina, *Beijing – Die politischen Spiele in China: Die Auswirkungen der politischen Lage in China auf die Sportberichterstattung der Olympischen Spiele 2008 in Peking am Beispiel der FAZ*. Saarbrücken, 2010.

5 Poerner, Michael, "Das olympische Feuer brennt. Und mit ihm lodert das Misstrauen" – Die Chinaberichterstattung während der Olympischen Sommerspiele in Beijing 2008. I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09, Nr. 1. S. 161–180, 2009.

多被塑造成对手甚至敌人的形象；而中国媒体的报道则以正面和颂扬基调为主，基本没有批评中国的言论出现，虽不可避免冲突主题，但主基调依然是褒扬。该书作者认为，德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虽然都呈现“扭曲”的中国形象，但德媒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更接近真实。<sup>1</sup>

德国近两年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也存在少量研究2008年之外时段的德媒涉华报道的著作和论文。其中选择语料跨度时间较长的一个研究成果为科隆大学国际政治系出版的学术刊物《从理想化到妖魔化：中国形象在变迁？关于德国跨地区媒体中的评论类涉华报道的媒体分析》。该刊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法兰克福汇报》和《南德意志报》在1993-2007年间的特定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为：涉华报道呈现负面趋势，一方面短期的、高频率出现的负面头条新闻导致负面中国形象的形成，另一方面涉华报道多使用刻板印象以及使用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权力相关的报道框架。<sup>2</sup>

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仅15页的学期论文《德国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形

象》，作者在文中没有给出所使用的语料具体来源和具体分析方法，只是分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等四个领域对中国形象进行总结，所得到的结论为：中国媒介形象与德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密切；一方面涉华报道呈现负面趋势，另一方面勤奋的、黄皮肤的、总是微笑着的中国人形象作为刻板印象存在于报道中。<sup>3</sup>

《真实的中国和失真的中国：〈明镜〉周刊（2001-2004）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与上述论文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该书在总结梳理德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及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之后，通过分析《明镜》在2001年至2004年间的涉华报道获得中国形象。作者得出结论为：一方面《明镜》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更多是旧中国形象，另一方面作者表示该刊涉华报道是均衡的、具有批判性的，但并非片面负面的。<sup>4</sup>

相关研究成果中视角较为独特的，是基于报道配图，而非报道文字本身进行分析：《〈明镜〉周刊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关于2004年和2009年报道配图的对比分析》一书采用定

量的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比《明镜》2004年与2009年两年涉华报道中的报道配图及配图文字，获悉并描述当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分析2009年的中国形象与2004年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确定德国政府换届前后德媒涉华报道的变化所在。<sup>5</sup>

除了学术研究成果外，德国媒体界也有对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再观察的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时代》记者花久志（Georg Blume）的著作《中国不是邪恶帝国》，作者在书中指责德国媒体过分负面报道中国，他表示德国政治新闻界多年来一直坚持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路线，他说“我通过自己在中国多年的记者生涯知道，将中国共产党等同于蔑视人权者已经成为新闻界的公式化路线。但是这个公式是错误的，彻底错误的。”<sup>6</sup>

另一位德国记者弗朗克·西伦（Frank Sieren）于2011年出版著作《对中国的恐惧：新的世界大国如何利用我们的危机》，该书以中国在德国引发的恐惧情绪为观察对象。作者表示，“‘对中国的恐惧’已经渗透到德国人

1 Peuckmann, Lukas, "One World, One Dream?". *Das Bild Chinas in der Olympia-Berichterstattung*. Berlin, 2010.

2 Seibt, Alexander, *Von der Idealisierung bis zur Verteufelung. Das Bild Chinas im Wandel? Eine Medienanalyse der Kommentare zu China in der deutschen überregionalen Presse*. (Arbeitspapiere zu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 und Außenpolitik. 2010, Nr. 3). Köln, 2010.

3 Nübel, Sylvia, *Das Bild Chinas in deutschen Medienberichten*. München, 2008.

4 Gui, Hao, *Das wahre und unwahre China. Das China-Bild im Wochenmagazin "DER SPIEGEL" von 2001 bis 2004*. Saarbrücken, 2007.

5 Braun, Johanna, *Das Nationen-Bild Chinas im Nachrichtenmagazin, "DER SPIEGEL": Eine vergleichende Bildanalyse der Jahrgänge 2004 und 2009*. Saarbrücken, 2011.

6 Blume, Georg, *China ist kein Reich des Bösen. Trotz Tibet muss Berlin auf Peking setzen*. Hamburg, 2008.

的日常生活中”，<sup>1</sup>这种现象非常危险。关于是否应惧怕中国，作者本人的观点是：“中国并非越发强大并终将碾压我们的敌人，但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有时也非常无情的竞争对手。”<sup>2</sup>

除了著作形式外，多家德国媒体都曾就中方指责德国媒体过于负面报道中国这一主题进行报道。而且涉及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活动或者研究成果也往往会引发德国媒体关注，比如2008年“中德媒体对话”研讨会召开之后，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在《日报》发表题为《妖魔化中国》的文章报道研讨会的内容。<sup>3</sup>前文所提及的调研报告《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出版后，也有相关德国媒体对该研究成果进行详细报道。<sup>4</sup>

综合来看，德国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关注2008年德媒涉华报道，其中又以奥运会报道受关注程度居高。从研究结论看，大多研究成果都表示，德国媒体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倾向为主，且报道中大量存在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另外，2008年报道分析显示，德媒涉华报道聚焦冲突事件和危机事件，且具有政治中心倾向。从研究方法看，相关研究成果多采用内容分析法。

### 国内关于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从总体上看都出现在2005年之后，但不像德国相关研究成果那样主要以德国媒体2008年的涉华报道为分析语料。

#### (三)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综述(中国)

国内关于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从总体上看都出现在2005年之后，但不像德国相关研究成果那样主要以德国媒体2008年的涉华报道为分析语料。在研究德国媒体涉华报道以及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方面，国内尚无专著形式的研究成果，而主要是以论文、专著的组成部分等形式出现。从语料来源看，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所分析的报刊数量相对较少(大多为一份报刊)，其中又以《明镜》报道被用于分析的频率最高。

根据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不同，国内研究成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论文

主要在内容层面关注涉华报道，此类论文选择分析某德国报刊在某自然时间段(即并非与特定事件挂钩的时间段)内的涉华报道，从而获悉中国在所分析报刊的各报道领域中呈现的形象，并分析导致特定中国形象形成的诸多原因。这一类论文的数量相对较多，语料覆盖时段也相对较长，而且多使用内容分析方法。此类论文包括：

张征和冯静在论文《〈明镜〉周刊之“镜中中国”解析》中分析《明镜》1999-2002年间的涉华报道，得出结论为：涉华报道数量在增加，且随着德国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德媒涉华报道呈现经济报道增加、人权报道数量减少的趋势；《明镜》报道展示了经济上繁荣、政治上保守、军事上野心勃勃、存在众多社会问题的中国形象。<sup>5</sup>贾文键在《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国形象》一文中对《明镜》2006和2007年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称，该刊涉华报道以负面报道占主导地位，作者表示，其原因在于德国的国家利益面临挑战、德国人的文化自信面临危机及“跨文化沉默的螺旋”现象。<sup>6</sup>刘继南等的著作《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中有一章内容涉

1 Sieren, Frank, *Angst vor China: Wie die neue Weltmacht unsere Krise nutzt*. Berlin, 2011.

2 同上。

3 Heberer, Thomas, “Die Verteufelung Chinas”. In: *taz*, 16.04.2008, <http://www.taz.de/!15918/>.

4 Hansen, Sven, “Keine Verschwörung”. In: *taz*, 17.06.2010, <http://www.taz.de/!54132/>.

5 张征、冯静：《〈明镜〉周刊之“镜中中国”解析》，载《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2期。

6 贾文键：《德国〈明镜〉周刊(2006—2007年)中的中国形象》，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4期。

及《法兰克福汇报》2000—2003年间的涉华报道分析。该章得出结论称，在世界主流媒体报道中中国所呈现出的形象是：在经济上发展快，虽有问题但整体趋势积极向上；在政治上不开明，人权形象糟糕；在社会法律方面，存在问题较多。总之，是各方面都有待提高的发展中国家形象。<sup>1</sup> 王志强在《德国〈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2004—2009）》一文中对《时代》的涉华经济报道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称，德媒涉华经济报道呈现负面倾向性，且受到德国政局变化的影响。作者认为，施罗德时期涉华经济报道较为客观，默克尔执政时期涉华报道反映出德国政界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戒心。<sup>2</sup> 此类论文中还有一篇以影像资料为语料，即冯德律的论文《德国电视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探析》，通过对德国三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描述，该文得出结论认为：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中通常都有正、反两个方面，既呈现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又涉及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问题以及中国社会问题等。<sup>3</sup>

第二类论文主要在新闻制作层面关注涉华报道，如语言使用、主题选择等，此类论文选择分析德国报刊就中国境内发生的特定事件进行的报



道，或者分析与特定事件相关的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德媒涉华报道，从而揭示德媒在具体事件上的倾向性。这一类论文关注的新闻事件多与2008年相关（西藏事件、奥运会事件），所分析语料覆盖时间相对较短，分析层面多集中于词汇层面或者主题层面。此类论文包括：

王异虹与张晓玮等在《德国主流媒体重构的“西藏问题”——德国媒体涉藏报道内容分析》一文中，对2008年3月至2009年3月间《世界报》、《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图片报》和《时代报》中的“西藏问题”报道进行分析，发现德媒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之高超常，而且负面报道倾向程度高。从选词方面看，报道多用褒义词指称描述暴乱分子，而使用贬义

词指称中国政府。<sup>4</sup> 沈妍在《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以德国〈图片报〉对奥运前后的中国报道为例分析》一文中，对《图片报》在线版和《图片报》纸质版在2008年3月至11月间的相关涉华报道进行分析。该文得出结论称，奥运举办前后相关涉华报道的主题选择都以负面居多，而且在信源选择方面，德媒对中国官方信息明显持不信任态度。作者认为，负面中国形象塑造受到思维定式和意识形态的影响。<sup>5</sup> 熊健在《从媒体报道谈德国对西藏问题的误解》一文中分别从选词和报道视角出发对德媒关于西藏问题的报道进行分析，结论显示，德媒针对中国政府 and 达赖集团使用不同报道倾向，同时该文也阐述了德媒歪曲西藏问题的多层次原因

1 刘继南、何辉：《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2 王志强：《德国〈时代〉周报视角下的经济中国形象（2004—2009）》，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

3 【德】冯德律著，谢震宇译：《德国电视纪录片中的中国形象探析》，载《德国研究》2007年第4期。

4 王异虹、张晓玮、何苏鸣、丁洁、江晓川：《德国主流媒体重构的“西藏问题”——德国媒体涉藏报道内容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2期。

5 沈妍：《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以德国〈图片报〉对奥运前后的中国报道为例分析》，载《东南传播》2009年第1期。



所在。<sup>1</sup>魏艾在《浅谈新闻的涵化作用——以2009年至2010年〈明镜〉周刊涉华报道为例》一文中对《明镜》2009年1月至2010年3月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刊涉华报道在选题上以负面居多。除此之外,报道还通过新闻手段在主题、语言、标题选择、封面等多方面将隐含的关于中国的负面观点传递给读者。<sup>2</sup>也有少量论文选取2008年诸事件以外的其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如钦文在《德国报章中的中国形象》一文中对《法兰克福汇报》和《南德意志报》2003年关于磁悬浮、德国哈瑙核电厂对华出售两个事件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与1998年之前相比较,“在德国媒体的涉华报道中产生了一种令人担忧的倾向:中国正日益被妖魔化”。<sup>3</sup>在《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评析:以〈明镜〉为例——兼议德国研究的一个视角》一文中,作者夏汛鸽对《明镜》2007年第3期封面报道《红色中国股份

公司》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分析显示,该报道一如《明镜》一贯的风格,对中国经济的负面效应提出尖锐批评。<sup>4</sup>

第三类论文更多是对德媒涉华报道进行泛泛地评价,或者结合与德媒涉华报道直接相关的事件分析德媒报道中国的方式和风格。此类论文包括:中国前驻德大使梅兆荣总结了近年来德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主要特点,他认为,负面报道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也损害了德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中德双方共同利益的发展;<sup>5</sup>聂立涛基于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北京编辑部负责人黑尼希、“德国之声”中文部华人记者张丹红因为所谓“亲华言论”,分别被解职或停职事件,解读德媒在报道中国时的偏见和“有色眼镜”视角。<sup>6</sup>

在写作本论的过程中,笔者也将阶段性研究结果形成论文发表,其中包括《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德媒体对话”》:就中德双方关于德媒涉华报

道是否客观公正的争论,笔者提出,由于中德双方存在媒体差异、文化差异和记者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争论无果,必须上升至跨文化层面进行二阶观察此问题方可得到解决;<sup>7</sup>《负面中国形象之跨文化解读——以德国〈时代〉周报(2006-2007)中的中国形象为例》:该文对《时代》2006-2007年的涉华报道进行分析,并以跨文化交流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维度等视角为切入点,阐述《时代》涉华报道负面倾向居多的原因;<sup>8</sup>《2008年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时代〉周报(2008)和〈明镜〉周刊(2008)中的中国形象为例》:对《时代》和《明镜》2008年涉华报道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在政治领域呈现极其负面的形象,另一方面《时代》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整体倾向中性,《明镜》所塑造的中国形象整体倾向负面;<sup>9</sup>《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德文发表标题:Chinabilder in deutschen Medien):通过分析《时

1 熊健:《从媒体报道谈德国对西藏问题的误解》,载《新闻传播》2009年第7期。

2 魏艾:《浅谈新闻的涵化作用——以2009年至2010年〈明镜〉周刊涉华报道为例》,载《新闻世界》2011年第1期。

3 钦文:《德国报章中的中国形象》,《中德文化对话》(第一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夏汛鸽:《德国媒体中的中国报道评析:以〈明镜〉为例——兼议德国研究的一个视角》,《德国·欧盟·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50—54页。

5 梅兆荣:《关于德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载《德国研究》2008年第4期。

6 聂立涛:《“有色眼镜”下的对华报道——从德国记者解职看西方媒体的虚伪性》,载《中国记者》2008年第9期。

7 周海霞:《从跨文化视角看“中德媒体对话”》,载《德国研究》2009年第1期。

8 周海霞:《负面中国形象之跨文化解读——以德国〈时代〉周报(2006-2007)中的中国形象为例》,载殷桐生主编:《德意志文化研究》(第5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9 周海霞:《2008年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时代〉周报(2008)和〈明镜〉周刊(2008)中的中国形象为例》,载王炳钧主编:《德语学习学术版》(第2期),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代》和《明镜》两刊中有关杯葛奥运的辩论的报道,揭示德媒涉华报道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与价值观利益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sup>1</sup>《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媒体中的动态中国经济形象——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和《时代》周报 2009—2010 年涉华报道为例》:使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经济危机语境中《明镜》和《时代》塑造的中国经济形象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为:中国经济形象围绕德国经济利益呈现多变性特点,这背后折射出德国的利益尺度和诉求。<sup>2</sup>

需指出的是,中国新闻界也存在对德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再观察,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环球时报》,该报总是及时报道德媒涉华报道的最新动态,并做出相应的评论。

#### (四) 小结

纵观国内外关于德国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成果,可以断定:首先,对某特定事件或突出年度的德媒涉华报道的观察多于对德媒涉华报道进行的长期观察,分析语料覆盖时段超过五年的研究较少。其次,从深度上看,德国国内出版的研究成果挖掘深度更大,这从德国研究成果多以著作形式存在可以看出,国内目前尚无深度和长时间跨度挖掘德媒涉华报道的研究成果;从内容上看,国内研究成果更

多注重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揭示德媒涉华报道呈现负面倾向的原因,或者通过新闻制作层面的特点分析,揭示德媒在特定新闻事件报道上表现出的倾向性。德国出版的研究成果的一个突出特点则在于:揭示德媒涉华报道中稳定传承的德国社会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并且也注重从德国记者在华工作条件的视角出发分析德媒涉华报道。从关注视角看,德国国内的研究成果多纯粹就事论事地研究德媒涉华报道的变化和负面倾向,并不考量其后果,而国内研究成果则更注重德媒涉华报道的负面倾向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而对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损害。这反映出中德两国学者截然不同的主体视角,德国学者不可能从中国国家利益视角出发观察德媒涉华报道,因此中国学界必须将德媒涉华报道过于片面和负面有损中国利益的信息传达出去。最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鲜有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考察德媒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形成,而多注重于关注中国形象是否失真。

本文拟对德媒涉华报道和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进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并深度挖掘德媒在塑造中国形象方面使用的论证结构,揭示中国形象背后的德国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利益,以及在更深层次上德国文化(广

义)作为德媒评价中国的衡量标准存在,并进而揭示德媒眼中的中国形象并非“真实”的中国形象,而是折射德国利益诉求的媒介建构形象。笔者希望该研究能够为中德双方一直以来就德媒涉华报道是否客观公正进行的争论提供一个对话视角,即不再讨论中国形象“是什么”,而应着眼于中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这样德国媒体才有可能自我反思,中方也才可以有的放矢地建构积极的中国形象。

### 三、总体研究设计

本论文选取德国主流印刷媒体《明镜》和《时代》2000—2010 年的涉华报道(抽样选取)为分析对象,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语料进行分析。

#### (一) 语料选取和语料的代表性

本文研究所基于的语料为《明镜》和《时代》的涉华报道。由于在国内完整获得时间跨度如此长的纸质期刊难度较高,且电子资源更易于查找搜索、保存以及整理,所以笔者利用《明镜》和《时代》的网页和其他相关网络资源搜集所需语料。获得所抽样的期刊全文资源(或链接)后,笔者使用德文词“China”(中国)、“Chinesisch”(中国的)、“Chinese”(中国人)、“Chinesin”<sup>1</sup>(中国人)以及这

1 Zhou, Haixia, Chinabilder in deutschen Medien. In: Casper-Hehne, Hiltraud/Schweiger, Irmy (Hrsg.), 2009. *Kulturelle Vielfalt deutscher Literatur, Sprache und Medien. Interkulturelle und kulturkonstrastive Perspektiven*. Göttingen. S. 223–238, 2009.

2 周海霞、王建斌:《经济危机时期德国媒体中的动态中国经济形象——以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和《时代》周报 2009—2010 年涉华报道为例》,载《德国研究》2011 年第 1 期。

些词开头共同的四个字母“chin”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所得到的报道中，笔者再逐篇排查确定哪些是重点报道中国和中国人的报道（只是提及中国或者在整篇报道中涉及中国的部分极少的报道不采用），最后形成语料集合。

从语料代表性来看，《明镜》和《时代》皆属于德国主流媒体，在德国新闻业享有“意见领袖”地位，具有内部议程设置的功能。因此分析两刊涉华报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二者主要属于政治报刊，基于两刊所得到的分析结果并不可简单推广用于德国所有的报刊，比如经济类报刊。但是二者作为业内意见领袖，具有引领德国公共舆论的地位，因此相关分析结果在德国公共舆论中仍然具有代表性。

## （二）本文理论基础与分析方法

本文以建构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建构主义认为，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并非对其真实原貌的镜像再现，而是认知建构的产物。无论在传播学领域，还是国家形象研究领域，建构主义视角都具有适用性：建构主义媒体观主张没有独立于记者和受众之外的现实，<sup>2</sup> 媒体建构的媒体现实是媒体根据特定标准进行选择之后的结果；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众多定义也都强调，一国形象并不等同于关于该国的“真相”，而是主体对一国的认识和评价。

**本文旨在揭示德国媒体涉华报道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是所谓的客观中立的报道，而是德国媒体根据特定规则（包括国家利益、价值观以及媒体系统内部规则等）进行选择操作后得到的结果。**

近两年国家形象领域研究成果中明确表示应从建构主义视角定义和观察国家形象已成为趋势。以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他者理论”主张异国形象具有他者特性，即他者形象是主体自我欲望的投射。该理论也具有建构主义理念，因此本文主张“他者理论”可适用研究媒体中的异国形象。本文运用的理论还包括跨文化交流理论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刻板印象和文化维度与文化标准等理论。

本文所采用的具体分析方法是同样蕴含建构主义理念的批评话语分析方法。该分析方法的出发点是：语言并非客观透明的中立传播媒介，而是语言实践。批评话语分析的宗旨在于对语言使用中被人们视为不容置疑的

内容进行“去自然化”操作，揭示语言的“权力”以及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揭示语言内外含而未露的东西。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媒体文本研究。本文选择使用以耶格（Siegfried Jäger）为代表的德国杜伊斯堡话语分析学派经过多年实践后设计出的可操作性分析方案，并依据分析需要对之进行一定的适用性调整。

## （三）本文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揭示德国媒体涉华报道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是所谓的客观中立的报道，而是德国媒体根据特定规则（包括国家利益、价值观以及媒体系统内部规则等）进行选择操作后得到的结果。德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并非关于中国的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是德媒建构的产物，是具有他者特性的，折射出德媒/德国作为观察主体的欲望和诉求。实现该研究目的的具体操作为：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对德媒涉华报道中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自然物”进行“去自然化”操作，从而揭示出德媒涉华报道语言内外言而未明、含而未露的内容，解构并质疑德媒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和近年来兴起的中国威胁论。综上，本文的研究问题为：德媒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呈现怎样的中国形象？这样的中国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德媒所建构的中国形象

1 德文中指称人的名词按自然性别区分男性与女性，如 Chinese 指“中国（男）人”，Chinesin 指“中国（女）人”。

2 Bentele, Günter, Wie wirklich ist die Medienwirklichkeit. In: Bentele, Günter/Rühl, Manfred (Hrsg.), 1993: *Theorien öffentlicher Kommunikation*. München. S. 152-171, 1993.

折射出怎样的主体诉求和意志?

#### (四) 本论文基本框架

本论文分为绪论、论文主体和结束语、参考文献等部分,其中论文主体又分为理论和实证分析两大部分。理论部分第一章阐述本文的认识论基础,建构主义认为,人对世界的认知并非对外在真实的镜像再现,而都是主体建构的结果。第二章的内容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传播学,建构主义视角的媒体观主张新闻报道并非对于社会真实的镜像再现,而是媒体系统根据特定的规则主动选择后所建构的媒体现实。第三章处理对象为国家形象理论,本文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传播学理论观察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媒体建构的异国形象并非该国真实情况的反映,而是媒体主动选择建构的结果。此外,本章结合跨文化交流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和刻板印象等视角阐述国家形象的特点。第四章主要涉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即批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同样蕴含建构主义理念,它重在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通过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媒体中的异国形象的形成过程。

实证分析部分共九章,分别依照报道主题分析德媒涉华报道,并基于分析结果获得该主题下的中国形象。实证部分所涉及话语束依次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社会、

**从实践层面看,在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德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却益发负面的情况下,分析研究德媒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以及中国形象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了解德国对华舆论、把握德国对华政策走向、前瞻性地设计对德关系和所持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国际关系、中国科技发展、中国文学艺术与传统文化、中国军备、中国体育等。实证部分最后一章对各话语束的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同时也综述各领域呈现的中国形象侧面。

#### (五) 研究意义

从实践层面看,在国家形象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德国公众眼中的中国形象却益发负面的情况下,分析研究德媒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什么”以及中国形象是“怎样形成的”,对于了解德国对华舆论、把握德国对华政策走向、前瞻性地设计对德关系和所持态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德国媒体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整个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代表,因此研究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也有利于把握整个西

方社会的中国形象。了解中国在德国的形象及中国形象形成背后的深刻原因,有利于我国在进行国家形象宣传时提高针对性,消解或削弱某些不利因素,提高和强调突出有利因素。

了解德国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对于中德跨文化交际教学研究领域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利于中国公民更好地把握自己在德国的活动,更有效更成功地进行个体层面的跨文化交流。

从理论层面看,国内目前对于外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是从国际关系研究和对外传播的视角进行的,且多以现实主义为研究的认识论基础。<sup>1</sup> 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结合传播学理论与跨文化交流理论,研究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在分析获得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同时,重点揭示中国形象作为媒体现实的建构性及其形成过程,这点主要通过分析德媒涉华报道的选择性行为实现(如议程设置和论证结构等)。同时,本文也将德媒涉华报道置于政治、经济、跨文化大框架中进行分析,从而探究隐藏在德媒涉华报道背后的、导致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所在。无论从分析视角、分析语料的时间跨度,还是分析挖掘深度看,本文在国内关于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中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

1 目前从建构主义视角解读媒体中的异国形象的研究都是从温特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建构主义视角进行的,依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 斯里兰卡国家利益考量中的 中美权重初步分析<sup>1</sup>

马仲武 /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  
徐亮 / 北京外国语大学档案馆

### 摘要

通过对中斯、美斯经贸、首脑往来、外交政策相似度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仍然是斯里兰卡政府对外决策中最重要国家，但是发展趋势是中国将超越美国。

### 关键词

斯里兰卡 中国 美国 国家利益 权重

<sup>1</sup>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斯里兰卡国家利益考量中的中美权重初步分析》的研究成果。

中国的传统智慧里，言和行是一对矛盾，有时候是言行一致，有时候则是言行不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外交辞令和实际发生的情形通常有着重大的区别，甚至可能是根本性的，外交辞令本身只能反映一定的情况。如有些国家之间称兄道弟，但实际上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像辞令表达的那样。如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关系，尽管两国的实际关系陷入了低谷，但是两国仍然互称“同志”。“同志”显然要好于朋友，但是实际上当时的中苏关系远不如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全天候伙伴”国家的关系。

那么，究竟按照什么标准来测量隐藏在外交辞令背后的国家重要性排序呢？本文拟就中美两个国家在斯里兰卡国家利益中的考量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1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南亚岛国斯里兰卡从战争中恢复，华盛顿应该加强同它的联系，否则将会面临将其“输给”中国和西方敌对国家的危险。《纽约时报》评论称，这一表态恰恰说明西方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弱。美国是斯里兰卡主要的援助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经济改革、平衡推行民主进程、解决民族问题立场上支持斯里兰卡政府。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地位明显上升，中斯不仅保

**中国的传统智慧里，言和行是一对矛盾，有时候是言行一致，有时候则是言行不一。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外交辞令和实际发生的情形通常有着重大的区别，甚至可能是根本性的，外交辞令本身只能反映一定的情况。**

持友好关系，高层互访频繁，而且经济贸易额呈现快速上升的势头，以至引起西方的猜忌。可以说，中国和美国在斯里兰卡都有着重大的现实利益，斯里兰卡位于中国石油和贸易运输线的重要位置，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如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贸易也要通过斯里兰卡海域。长期以来，斯里兰卡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向美国倾斜，从而获得了庞大数额的外部援助和投资，促进了斯里兰卡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美国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批评和疏远，使得斯里兰卡和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合作关系逐步上升。

通过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政治决策、外交措施、经济贸易、文化往来的资料研究，对掩盖在外交辞令之下的斯里兰卡政府国家利益考虑下中国和美国权重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

## 二、理论的假设

国际关系学不仅关注国际政治现象，更需要研究国际政治的本质问题。在斯里兰卡的政府公文和声明里，研究者无从判断中国和美国在斯里兰卡政府的国家利益考虑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到了何种程度（量化研究）、会向哪个方向（质的研究）继续发展，这个问题集中体现于在斯里兰卡政府国家利益考虑下中国和美国权重比较问题。而要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中斯、美斯的实际政治、经济、文化往来中才能得到确切的研究结论。

第一种假设，从外交辞令判断，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好于美国。从1952年《米胶协定》到2007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两个国家的关系是“大小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可以说中国从未批评过斯里兰卡的国内政策，这与中国自身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密切相关。而美国方面在多年的《世界人权报告》中，对斯里兰卡政府进行批评，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军对抗加剧，美国对斯里兰卡的批评也呈现更加密集的趋势。2009年1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称，斯里兰卡这个历史上和美国友好的岛国正加强同中国以及伊朗、缅甸等国的关系，而慢慢与华盛顿疏远。报告警告称，“美国‘输不起’斯里兰卡。如果美国只是一味

地批评而不与斯里兰卡接触，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缅甸一样走下坡路，最终‘与世隔绝’”。<sup>1</sup>从这个角度来判断，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似乎比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要好。

第二种假设，从经济贸易往来看，美国与斯里兰卡的经贸额要高于中斯经贸额，“美是斯主要援助国和最大的贸易伙伴”。<sup>2</sup>如果从这个事实来判断，显然与第一种假设相互矛盾。

第三种假设，从互访的频度来看，中国呈现上升的态势，但是仍然没有美斯之间的历史数据绝对值大。如果从这里判断，则美国与斯里兰卡关系要好于中斯关系。但是如果从2001-2010年之间的数据进行判断，则可能得出中斯关系好于美斯关系的结论，这两个结论恰恰是矛盾的。

从以上的假设和分析可以看出，单纯从政治、经济、外交的任何一个单纯的角度分析判断，可能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那么究竟如何判断美国、中国、斯里兰卡政府决策中的权重呢？本文提出“现状—发展比较法”，将比较划分为两个层面，即现状如何以及发展趋势如何。比如中国的综合国力从现状看要差于美国，但是中国的国力还在增长中，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后者就是发展比较。现状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实，

而发展比较则有利于我们把握未来。

### 三、理论分析

1. 高层访问量反映中国比美国在发展方面有优势。

国家首脑（总统、总理以及议会议长）的访问频度或者总量反映国家之间密切和相互交往的程度。根据估计，1957年2月7日中国与斯里兰卡两国建交后，中斯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高层往来不断，中方的访问1957-2006年副总理级别访问17次，斯方1957-2007年访问中方的总统总理级别15次（含3次外长访问）。再看美国方面，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的前身锡兰获得独立后，助理国务卿以上的美国官员访问斯里兰卡28次，斯里兰卡方面总统总理级别（包括代表国家的外交部长）的有14次。从这个数据来看，美国的重要性低于中国方面，那么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往来频度密集在21

世纪初期，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与斯里兰卡的高层往来呈直线上升的趋势，高层互访逐年增多，呈现一个上扬的曲线。

那么美国与斯里兰卡方面的往来密集程度如何，我们可以从表2中窥探究竟。由表2可以看出，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期，基本上关系比较稳定。（见表2）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仍然是斯里兰卡政府对外决策中最重要的国家，但是发展趋势是中国将超越美国。

2. 经济贸易额反映美国仍然是斯里兰卡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中国的分量正在快速跃升。

2012年总部设在纽约的世界政策研究所曾经发表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墨西哥、哥伦比亚、巴尔干、斯里兰卡、印尼、菲律宾、苏丹和非洲大湖地区发生的冲突中，美国武器

表1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间的中国与斯里兰卡高层往来次数统计表

时间段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00-2007年	合计
高层互访次数	1	2	4	6	8	11	32

表2 20世纪4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间的美国与斯里兰卡高层往来次数统计表

时间段	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50年代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00-2007年	合计
高层互访次数	0	4	6	9	10	11	11	51

1 《美国称斯里兰卡战略位置重要，担心其接近中国》，载《环球时报》2009年12月10日。

2 《斯里兰卡国家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28/](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28/)。

3 钟声：《美国军火走俏加剧地区安全困境》，载《人民日报》2012年8月28日。

起着支配的作用。”<sup>3</sup>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斯里兰卡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地位到 21 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11 年是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成为斯里兰卡出口第二大国，仅次于印度，但是仍然只占其出口总额的 1.1%。<sup>1</sup> 2011 年斯在普惠制下对美出口额达 1.35 亿美元，<sup>2</sup> 但是和中国相比，无论是增长幅度还是绝对额度，都有所下降。

3. 外交政策来看，中国给予斯里兰卡更多的政策空间。

斯里兰卡政府长期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维护斯里兰卡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允许外国对斯内政和外交事务进行干涉，这些都与中国的一贯立场相互吻合。另外，斯里兰卡关心国际和地区安全，主张全面彻底裁军，包括全球核裁军以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客观上支援了中国政府的国际秩序主张。

难能可贵的是斯里兰卡和中国一样坚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1998 年 1 月签署了《联合国反恐怖爆炸公约》，成为该公约的第一个签字国。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斯里兰卡政府的外交重点是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在联合国和南



盟等组织内呼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府的立场。表 3 为吻合度比较： 如果将“主张”、“支持”作为积极的吻合，而“反对”、“不支持”作

表 3 外交政策中国、美国与斯里兰卡的吻合度

立场/国家	斯里兰卡	中国	美国
独立	主张	主张	不支持（新干涉主义）
不结盟	主张	支持	不支持
裁军	主张	主张	不支持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主张	主张	反对
反恐	主张	主张	主张

1 《2011 年 7 月斯里兰卡贸易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26719](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26719)。

2 《美国继续对斯里兰卡实行普惠制》，载《国际商报》2012 年 7 月 3 日。



为消极的吻合，那么仅仅就这几条关键的外交政策而言，中国和斯里兰卡有 90% 以上的吻合度，而美国和斯里兰卡只有 10% 的吻合度。相对中国的立场，美国的立场更加倾向于施加某种压力，特别是小布什的新干涉主义，引发了斯里兰卡的不满；美国对斯里兰卡等国家人权状况的指责，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警惕和不满。在气候问题上，斯里兰卡更是和南太平洋小国一样，关注自己的处境，批评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可以说，斯里兰卡对美国的政策是小国对霸权国家迫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但是由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政治军事强权，斯里兰卡不得不采取与美国接近的策略。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因此，美国仍然是斯里兰卡最为重视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和斯里兰卡外交理念和政策的接近，特别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大小国家平等的政策，中斯关系更有发展空间和前景。

####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对斯里兰卡和中美政治、经济、外交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在斯里兰卡政府的国家利益实现途径中体现的中国和美国孰轻孰重的权重以及政府决策的未来取向和发展趋势，这些内容值得我国外交决策者参考。

##### 1. 中美在斯里兰卡外交中权重

**一个政治更加宽容、经济更加健康的大国对小国更有吸引力。通过中美两个国家在斯里兰卡国家利益考量中的比较，可以建立“2 个大国 -1 个小国”互动博弈的分析模型，即“现状 + 发展比较分析”，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辩证发展的分析路径。**

的变化既反映了美国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现实，也反映了中国的崛起对世界中小国家的影响正在成为现实。

如果说 20 世纪斯里兰卡的外交中心一直在欧美等西方国家，那么进入 21 世纪以后，斯里兰卡的对外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从偏向西方逐步向亚洲主导方向发展。

2. 随着中国地位的相对上升，美国地位的下降，中美在斯里兰卡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中美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斯里兰卡实现双赢，但更多的领域内是竞争关系。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使得美国政府开始注重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干预。美国学界一再刊登要求政府重视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家作用的文章在竞争中发挥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3. 中国的崛起将使更多中国周边国家得到实惠，这些国家的外交决策将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中斯关系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通过量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处于上升阶段，正在超越美斯关系。而美斯关系长期稳定，也等同于停滞不前。从发展趋势的预测来看，中国将在 21 世纪的初期二十年内斯里兰卡外交中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这种地位获得的时间和速度，取决于美国的竞争以及中斯是否能够保持这种友好的势头。

4. “2 个大国 -1 个小国”互动博弈中，小国自动趋利避害。

一个政治更加宽容、经济更加健康的大国对小国更有吸引力。通过中美两个国家在斯里兰卡国家利益考量中的比较，可以建立“2 个大国 -1 个小国”互动博弈的分析模型，即“现状 + 发展比较分析”，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结合在一起，从而建立起辩证发展的分析路径。

当然，本文的分析只是初步的，以上的分析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美斯贸易额、中斯贸易额的中美汇率换算标准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因而造成误差。另外，由于相关研究资料的不完备，统计的准确性有待提高，这些都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 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文献综述<sup>1</sup>

任康钰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 摘要

中央银行是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也是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本文基于文献讨论了中央银行的资本金及相关问题。文章首先从如何理解央行资本金的基本性质出发，然后围绕着中央银行是否需要资本金这一问题展开。通过对一些国家中央银行的实证观察和理论上的论证，大多文献都认同了资本金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和效果的作用。接着，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中央银行的适量资本金水平、资本金缺乏时的补充机制以及一些新的演进背景下资本金角色等相关问题，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资本金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果的作用。随着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近年来的变化，也需要特别注意资本金的问题，为保证货币政策效果提供条件。

### 关键词

中央银行 资本金 货币政策 物价稳定

1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科研资助项目《对亚洲几国中央银行资本金的观察和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引言

资本金是经济社会中一个最为基本的概念，是经济实体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对于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而言，资本金是银行经营所必需，它充当着缓冲损失的作用。因此，资本金是管理和监管都非常关注的部分。例如，针对国际活跃银行监管的《巴塞尔协议》的一系列内容都围绕着资本充足展开。

但是，不同于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金融机构，承担着经济体中货币发行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有关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理解套用在中央银行上。那么，如何理解央行的资本金，以及与资本金相关的一些问题，对理解中央银行的运行进而货币政策的执行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以往关于中央银行资本金的研究并不多，正如 Cukierman (2011) 中指出的那样，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很多中央银行还是被政府控制着，作为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因此，中央银行的资本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概念。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中央银行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物价稳定目标等问题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开始陆续形成了一些关于央行资本金研究的文献。监管者和学术界都希望能够研究发展出一些有关央行资本金的规则并将其应用到世界各国 (Bindseil et al, 2004)。最近的研究主要源于 2007 年开始于美

**一般来讲，资本金是一个机构的自有资金，是该机构所有者直接投资的资金和不断累积的留存收益，也是该机构所有权的证明。不过，资本金的具体内容一般都由一国的监管机构和会计准则来规定。**

国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如 Buiter (2008) 提出了央行是否会破产的问题，就基于危机后很多中央银行如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等都采取了大量的救助行动，从而使自己暴露在更多的风险中，面临着资本金被侵蚀掉的可能性。Ize(2005) 观察到，之前很多年世界范围内通货膨胀率和利率走低，引发一些中央银行出现损失，从而带动对央行资本及其补充等问题的讨论。Pringle (2003) 则出于对日本银行的担忧研究了央行资本金问题。更早的 Stella (1997) 也提到发生在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资本金损失的问题。

本文围绕中央银行的资本金，通过对主要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及讨论，以期获得一个有关央行资本金已有研究的基本概览，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文章分为几个部分展开：第一，对央行资本金基本性质的讨论，这是理解其他问题的前提。第二，中央银

行是否需要资本金？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就会自然引出中央银行的适量资本金或充足资本金的问题。第三，进一步分析央行资本金的补充问题，这一问题反过来也与第二部分中提出的问题互相呼应。第四，还有一些文献关注到了开放经济中中央银行新的演进，有三个方面的扩展：一是全球化背景下央行的资产负债中的货币错配；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下中央银行的资本金问题，还有美元化等国家央行的资本金问题；三是基于前面的讨论总结资本金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并特别就中国央行资本金及货币政策执行等进行分析。

## 一、央行资本金的基本性质

一般来讲，资本金是一个机构的自有资金，是该机构所有者直接投资的资金和不断累积的留存收益，也是该机构所有权的证明。不过，资本金的具体内容一般都由一国的监管机构和会计准则来规定。资本金往往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的最下端。因此，对于同样适用一般会计规则的中央银行，它在包括资本金的各项资产负债项目中与私人部门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中央银行毕竟是一个政府公共部门，还有其独特之处。例如，它是要执行货币政策、实现相应的货币政策目标，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政府部门，它不需要适用《破产法》，像私人企业那样在出现负的净价值 (Negative Net Worth) 时走向

破产。

那么，怎样在这样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背景下理解中央银行的资本金呢？首先就是从一般会计规则出发，正如 Buiter（2008）通过资产负债表给出的一个简单表述方法。（见表1）

表1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资产	负债
D:政府债券	M:基础货币
L:私人部门债券	N:其它非货币负债
R:外汇储备	W:财务净价值/资本金

根据资产、负债总额相等的原理得到资本金（W）为：

$$W=D+L+R-M-N \quad (1)$$

因此，观察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可以计算出其资本金的规模。Ueda（2004）观察了一些中央银行的资本金实际持有规模，并以资本金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观察央行在资本金持有上所呈现出的特点，发现：第一，该比值在各国有所不同；第二，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该比值普遍较低；第三，资本金较低的中央银行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第四，在美国、日本、欧盟中，美国的比值较低，日本和欧盟的比值较高。

资本金除了有规模大小的问题，还有内部结构的问题。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资本金的结构反映出其所有

**资本金除了有规模大小的问题，还有内部结构的问题。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资本金的结构反映出其所有者状态，也与公司治理等问题息息相关。**

者状态，也与公司治理等问题息息相关。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公共部门，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央银行资本金的具体结构没有实质的意义，也并不反映中央银行的实力（Cargill, 2005）。在实践中，央行的资本金结构也各不相同。例如，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是一家财政部拥有的股份公司，美国的美联储则由私人成员银行拥有其股份；欧洲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来自其27个欧盟成员国（而不只是欧元区国家）。

此外，文献中还提出了一些与资本金相关的概念或指标。与资本金直接相关的一个指标就是净值（Net Worth）。净值是指一个具有充分信息风险中性投资者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愿意购买该机构所出的价格。可见，相比较来看，净值比资本金更能够反映出一个机构存在的价值。对于一般

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而言，净值与资本金高度相关，甚至很多时候可以直接用资本金来衡量净值。但是，对作为政府部门的中央银行来说，净值的概念似乎就不那么相关了，<sup>1</sup>因为央行基本不存在“购买”或“出售”的问题。如果仅仅从净值反映的市场价值来看，由于会计规则的一些具体内容、中央银行特殊的发行货币职能，以及其可能面对的政府管制，中央银行的资本和净值之间也可以出现持续的巨大差异。有的时候，央行只有很少的资本金或甚至没有，但它仍然可以是很盈利的，有较高的净值；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可以存在（Stella, 1997）。

与资本金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财务（经济）实力（Financial Strength）。Stella（2005）和 Cargill（2006）将财务实力定义为银行弥补潜在损失的能力。从理论上讲，显然，资本金越多，弥补损失的能力越大，一个机构的财务实力就越强。但是，“潜在损失”的概念对于中央银行显然不同于对于一般商业性机构的含义。因此，对于中央银行而言，财务实力是指它能够获得足够的收入来弥补提供货币服务中所产生的成本的能力。而且，对于中央银行，财务实力与资本金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所变化。财务实力更与中央银行的公信力

1 一个特例是，瑞士的中央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的股份就是公开交易的。



(Credibility) 相关, 而公信力并不简单地由资本金的规模大小来限定, 就像日本央行的情形, 其资本金规模并不反映其财务实力。不过, 如果中央银行持续地遭受损失, 那它的财实力也会受到侵蚀。

还有一组概念是清偿力 (Solvency) 和经营失败 (Failure), 也经常文献中提及。对一般的机构如商业银行来说, 清偿力意味着大于零的资本金。资本金小于零则意味着缺乏清偿力 (Insolvency), 此时也就意味着该机构的经营失败, 需要被清算了 (Liquidated)。但是, 对于中央银行来讲, “清偿力” 更多是指中央银行维持其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 而这并不绝对地与名义资本量相对应。如果中央银行的资本金变成负数, 似乎也不能直接

推导出中央银行的失败 (Failure of a Central Bank)。

另外, Stella (1997) 还提到央行隐性资本金 (Hidden Capital) 的概念, 认为由于会计规则的原因, 比如央行的固定资产并没有记录在资产负债表上, 黄金用历史价格来计值, 证券以较低的历史价值计值等等, 可能使央行还拥有一些并不直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

## 二、中央银行是否需要资本金

对中央银行的资本金有了基本的认识, 使我们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 即中央银行是否需要资本金。这对于一般的商业机构来说不是问题, 但是却是有关央行资本金的文献所集中关注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金

的作用。这涉及到两个层面: 一是资本金的存在对中央银行本身作为一家经营机构的意义; 二是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和目标即功能角度来理解资本金的作用。

中央银行是一个特殊的公共部门, 如果从类似于传统商业银行的角度看, 即资本金是来自政府的资本贡献和留存收益, 那么, 资本金的存在对于这个机构本身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事实上, 美联储、加拿大中央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都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还有一些银行在负资本的情况下继续运作 (Stella, 1997)。

另外, 还可以看看各国对于处理中央银行损失的规定, 因为央行的损失会带来资本金的减少。因此, 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对央行资本金的态度。Vaez-Zadeh (1991) 观察了 60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法, 其中大约 33% 的央行并没有关于损失处理的明确条款。Pringle & Courtis (1999) 调查了 27 家中央银行, 发现他们只有关于利润分配的规则, 而没有如何弥补损失的规则。

对央行损失的“忽视”既可能是因为资本金不重要, 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认为从内在结构上看央行就不会面对损失或者持续的大规模的损失 Sweidan (2011)。然而, 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中央银行是有可能遭受损失的; 而且, 损失之后带来的资本金减少也确实影响到了中央银行的货

币政策操作和效果。

这样的结论首先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Almeida, Fry and Goodhart (1996) 较早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的资本金。Stella (2003) 观测到很多财务上脆弱 (Financially Weak) 的中央银行与高通货膨胀相联系; Stella (2002, 2005) 用代表央行财务实力的指标来分析其与物价稳定的关系, 然后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资本金与稳定物价目标实现的关系。Ueda (2004) 通过对一些央行的实际经验观察发现, 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既不是央行完成其责任的必要条件, 也不是充分条件。但是, 确实有一些案例显示, 不良的资产负债状况会成为物价稳定目标的主要障碍。Kluh & Stella (2008) 利用 176 个国家在 1987—2005 年间的发现, 中央银行的财务实力和通货膨胀表现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 Dalton & Dziobek (2005)、Sweidan (2011) 等也都对中央银行的损失及其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观察。

当然, 实证研究并没有确立一个关于资本金必要性的十分肯定而单一的答案。首先, 大多的实证观察都自然地落在了发展中或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央银行身上, 这些央行有更多的损失或资本金减少经历; 其次, 个别来自实践的证据是不一致的, 因为其他经济、政策因素也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及资本金发挥的作用。例如, 智利

在 1997—2000 年资本金短缺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物价稳定, 就主要得益于通货膨胀钉住制和当时处于盈余状态的财政收支。最后, 即便是有统计上的相关性, 也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所以, 文献中也提出了一些经济逻辑上的解释。

Stella (2003) 提出, 央行的资本金越充足, 其财务能力就越强, 需要财政救助的可能性就越小, 从而提高其公信力, 能更成功地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Pringle (2003) 认为, 央行资本金的消耗直至被用尽, 会影响中央银行的信誉。Fukui (2003) 针对日本央行的情况提出, 如果一个央行的资本金用完了, 则难以维持公众的信心, 从而会影响其货币政策的执行。Bindseil et al (2004) 基于央行资本金和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指出, 一定的中央银行资本金是保证其成功地履行职责 (获得物价稳定) 的要求。他们还在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设定中建立了关于中央银行的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演化的模型, 证明资本金水平与央行公信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Dalto & Dziobek (2005) 认为, 央行不能处理其财务损失即资本金不足的话, 就会伤害其公信力和独立性。类似地, Cargill (2006) 认为, 技术上, 一家中央银行不需要资本金来执行货币政策, 但是它确实需要有足够的收入来弥补提供货币服务的成本。Cukierman (2010) 也提出, 一旦央行的资本金为负值, 那么央行就更有

可能依赖财政部的资金注入, 从而面临更多的压力来放松货币政策。因此, 现实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多数现代中央银行都会持有一定额的资本金, 以此作为防范政治干预的保险。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以上从实践和逻辑上对央行资本金的分析, 承认资本金的存在对央行、或者说一部分央行 (可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央行) 的价值,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央银行到底需要多少资本金, 比如什么是一个合适的、充足的或者最优的资本金水平, 低于这一水平就会影响央行的运行。

Stella (1997) 提出了中央银行资本金充足 (Central Bank Capital Adequacy, CBCA) 的概念, 并认为以往文献中没有一个关于充足水平的精确定义。他还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结构 (The Structure of the Balance Sheet) 的概念, 有的结构本身就更有利于央行不断积累利润, 而有的则可能更经常地带来损失。这样的话, 它也影响央行适度资本金存量的水平。例如, 相对于美国和加拿大, 挪威的中央银行资产结构就更易于使其面临损失, 从而也增加了它对适度资本金的要求。

Ernhagen et al (2002) 通过研究资本金缓冲对央行独立性的影响, 为瑞典中央银行的最低资本金提出了一个粗略的计算方法, 考虑了中央银行的操作成本、铸币税收入等因素。

Martinez-Resano (2004) 也探

讨论了决定资本金适量水平的因素，考察了所有影响央行资产负债的风险，利用 VAR 模型，分析了资本、会计规则和红利分配之间的互相作用，并为央行财务能力确定了一个简单的基准。总的来看，央行的资本金充足水平依赖于其风险暴露、波动性、利润分配规则等各种因素。

Stella (2005) 又提出，中央银行需要确定一个资本金的目标 (Target) 或目标区间 (Target Band)，并结合现实中中央银行的做法总结出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个绝对的名义水平，如加拿大中央银行的做法。第二种是一个资本与另外一个资产负债项目的目标比值。第三种设定一个资本与某一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比值；美联储、日本银行、保加利亚央行、冰岛和爱沙尼亚的央行都属于第二或第三种。第四种是设定基于某一风险水平的资本水平，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当然，还有对以上方法的混合做法，比如欧洲中央银行的做法。

Ize (2005) 提出了一个量化的框架来评估在各种关键的政策和宏观经济变量确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对资本的需求。他提出“核心”资本 (Core Capital) 的概念，将其定义为要保证央行在实现通货膨胀目标上的公信力的最低资本要求。该核心资本可以表示为其运行费用和国际储备保管成本的函数。根据对三家中央银行公开账户、运行费用数据等的实证分析，他

**如果认同了资本金对于央行的作用，测度出了适度资本金的水平。那么，当资本金低于这一水平时，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对其进行补充，这一机制同时必然也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及其效果。**

证明了对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核心资本可能是一个较大的正值。

Cukierman (2011) 提出了资本金阈值 (Threshold) 的概念，认为央行的独立性和资本金水平之间是不连续的。在某一定的阈值之下，央行会严重地受到政治方面的压力；而在这一阈值之上，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再依赖资本金水平。因此，这一阈值实际上也就是适度资本金的含义。阈值的确定与一国的政治体系、经济冲击、汇率制度、金融机构等各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能正向影响阈值大小的包括货币政策要回应的冲击规模的大小、央行责任范围的大小、政府产生赤字的可能性的、汇率制度钉住程度的高低等；负向影响的因素则包括该经济体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的高低、经济总体状况的好坏等。

不管是直接找出一个适度的资本金水平，还是确定一个会影响央行运行的资本金临界值，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还没有达成共识 (Ueda, 2004)。

或者说，对这个问题没法有一个适用于所有中央银行的、精确的答案。因为适度资本金水平，某种程度上由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决定 (Ernhagen et al, 2002)。

### 三、央行资本金的补充

如果认同了资本金对于央行的作用，测度出了适度资本金的水平。那么，当资本金低于这一水平时，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机制对其进行补充 (Recapitalize)，这一机制同时必然也会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及其效果。

从央行资本金性质可以看出，其资本金补充机制肯定不同于商业机构。Stella (1997) 就提到，有关央行的“注资” (Recapitalization) 存在定义不精确的问题：这是一个“会计”设置还是对央行的一个实际资金转移？因此，需要从规则上界定如何对中央银行进行注资。Sullivan (2002) 就强调一套明确分配央行利润或损失规则的重要性，应该在中央银行法中明确规定怎样计算利润，怎样配置损失，以及怎样在危机时再获得资本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也建议政府通过透明的预算拨款等方法为中央银行进行注资 (Dalton & Dziobek, 2005)。

一般来讲，既然是资本注入，那么一定是获得来自外部的资源，因此，中央银行可以获得来自本国财政部、外国中央银行、国际组织如 IMF、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等方面的注

资。但是，由于中央银行还有着发行货币的功能，所以也可以间接通过调整货币性负债获得铸币税来进行补充，这一点是其他机构无法获得的。我们不妨把它们分别称为外部渠道和内部渠道。

先来看外部渠道。当中央银行出现资本金短缺时，可以通过直接获得外部注资来进行补充。在会计上，这样的补充非常简单，可以反映在表 2 中。

表 2 获得外部渠道的资本补充后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资产	负债
D: 政府债券	M: 基础货币
L: 私人部门债券	N: 其它非货币负债
R: 外汇储备	W: 财务净值/资本金
	+X

当外部渠道给予 X 量的资本补充后，相应地资产、负债都有等量的增加，<sup>1</sup> 新的资本金 (W+X) 应该是较为适宜的资本金水平。关键问题是，来自财政部等外部渠道的资本金补充有什么条件？如果这些条件影响到了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放宽了其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限制，势必会影响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这反过来又呼应了上文提出的问题，即中央银行应该持有有一个适宜的资本金规

模，从而避免进入需要补充的境地。

相对来讲，外部渠道直接明了，而内部渠道则较为间接。很多文献都提到了通过创造货币等方式来弥补资本金不足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对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理解这种渠道。（见表 3）

表 3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时期 0	
资产	负债
D: 政府债券	M: 基础货币+X
L: 私人部门债券	N: 其它非货币负债
R: 外汇储备	W: 财务净值/资本金
	+X
时期 1	
资产	负债
D: 政府债券	M: 基础货币+X
L: 私人部门债券	N: 其它非货币负债
R: 外汇储备	W: 财务净值/资本金+T
	+T

如表 3 所示，时期 0 中央银行通过增加货币性负债即在 M 上增加 X，同时资产部分也有相应的增加。<sup>2</sup> 到时期 1 新增的资产部分产生收益 T，可以成为中央银行的新增资本金 T。这就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获得铸币税来进行的资本补充。当然，在这

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在央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时市场中的债券存量如果不变的话，那么央行的债券需求增加势必拉高债券价格，带来利率水平下降。一方面基础货币的增加，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带来货币供应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市场的利率有下降的压力。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带来更为宽松的流动性和信贷环境，从而给经济体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也就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实现物价稳定的难度。Vaez-Zadeh (1991) 提到，如果央行想通过获得铸币税来弥补资本金的不足，必然受现有通货膨胀的限制。Stella (1997) 也指出，央行通过创造货币来弥补损失补充资本金，可能很快会带来与国内物价稳定目标的冲突。而且，如果央行的这种做法成为惯例，还会增加其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难度。

第二，如果央行的货币发行是通过购买财政部新发行的政府债券来实现的，则此时央行就又要受到财政部的制约，类似于上文从财政部获得有条件的资本补充，内部渠道也转化成外部渠道了。因此 Cukierman (2011) 提到，动态地看，任何央行的损失都最终会转化成中央政府的收

1 X 的增加在资产一方可以反映在不同的具体项目上。

2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货币创造的过程，通常，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来实现 M 的增加，所以资产方增加的主要是 D (政府债券) 或 L (私人部门债券)，当然也可以是 R (外汇储备) 部分的增加。但是，考虑到央行是为了增加资本金而进行的操作，所以资产的增加更有可能落在会带来收益的 D 或 L 上。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央行除了直接投放货币，还可以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来增加基础货币 (M) 中的商业银行准备金存款。



入减少或额外支出。当外部渠道的制约存在时，可能削弱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这时货币供应扩张本身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再加上可能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的影响，都会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目标产生一定压力。

第三，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发行的方式来补充资本金，会给市场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不过，央行可以选择一些方法来抑制这一影响。例如，同时通过监管等途径限制商业银行和公众的借贷行为。但是，显然这种方法是市场不欢迎的，而且本身会带来资金市场的扭曲，把显性的通货膨胀压力转化为隐性的通货膨胀压力。

第四，类似于货币发行，补充资本金的内部渠道也可以有另一个选择，就是中央银行自己发行债务工具，即通过增加负债中的N（其它非货币性负债）。但这一部分负债本身是有成本的，所以可能带来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风险。而且，这样做还会改变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性质，带来货币政策的扭曲（Sweidan, 2011）。

可以看出，对资本金补充的分析，回答了如何保持适度资本金的问题，但实际上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资本金存在的作用。央行资本金的补充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财政部的限制，也可能直接带来市场上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都会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及效果。这些又增强了央行

**关于中央银行的研究并不过多关注经济的开放程度，或者说假设是在单一经济体内进行研究。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央银行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演进，影响到对其资本金的理解。**

保持一定规模（适宜或充足）资本金的动机。

需要注意的是，文献从理论上分析了资本金补充的可能方法，但在各国实践中还要看具体的规定。例如，我国就在《中国人民法》中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亏损由财政拨款弥补”。当然，正像文章第一部分提到的，也有一些中央银行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理论分析还需要结合实际中的制度规定和操作。

#### 四、开放经济中的央行资本金问题

关于中央银行的研究并不过多关注经济的开放程度，或者说假设是在单一经济体内进行研究。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央银行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演进，影响到对其资本金的理解。因此，有一些文献注意到了这些趋势，并对它们展开了研究。这里，我们主要关注针对以下几种情形的中央银行资本金的研究文献，对其进行一些讨论。

#### 1. 全球化背景下货币错配（Currency Mismatch）的中央银行

在前面所列出的资产负债表中，我们基本没有关注资产中的外汇储备（R）。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流动规模不断增加，使一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投放有可能是通过增持外汇储备来实现的，尤其是对于要维持汇率稳定的国家。外汇储备的实际存在是外汇资产，但在记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时则一般要转化成本国货币。与此同时，央行的负债方一般是以本币形态出现的。资产和负债项目之间功能货币的不一致，就是货币错配问题。这时，如果根据一般的按实时汇率进行功能货币向记账货币转换的规则，那么本外币之间汇率的变化就可能影响中央银行的资本金。（见表4）

表4 汇率变化前后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时期1	
资产	负债
D:政府债券	M:基础货币+X
L:私人部门债券	N:其它非货币负债
R:外汇储备 = $e * X$	W:财务净值/资本金
时期2	
资产	负债
D:政府债券	M':基础货币+X
L:私人部门债券	N:其它非货币负债
R:外汇储备 = $e * X$	W:财务净值/资本金 = $W + (e' - e) * X$

根据时期 1 的资产负债表可得出：

$$D+L+eX=M+N+W \quad (2)$$

为了集中关注货币错配的问题，假设 D、L 和 N 都不变。e 为直接标记法下的初始汇率。对上式两边全微分，然后等式两边各除以原数值，可以得到：

$$\frac{edX}{D+L+eX} + \frac{Xde}{D+L+eX} = \frac{dM}{M+N+W} + \frac{dW}{M+N+W} \quad (3)$$

根据这一等式，我们可以进行不同情况下的分析。

第一种情形：仅发生汇率变动，则由 (3) 式可以推出：

$$dW=Xde \quad (4)$$

可见，如果本币升值，带来 de 为负时，则资本金减少。

第二种情形：央行维持汇率不变，但实际上面对的是持续升值压力。这时，e 不变，由 (3) 式可以推出：

$$dW=edX-dM=0 \quad (5)$$

这时，资本金不发生变化。但是，X 会因为央行的不断买入而积累，这就使未来如果汇率不能继续被抑制而转为升值后带来的资本损失更大，(4) 中右边的 X 项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种情形：央行维持汇率不变，但实际上面对的是持续的贬值压力。这时，类似于 (5)，央行的资本金不变。但是，央行维持汇率的努力带来的是 X 持续的减少，这一减少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货币错配的情形增加了央行资本金损失的可能。例如以色列 1990 年代的经历表明，维持币值的努力也会带来资本的减少。再回到有关



资本金的认识上，显然货币错配程度会影响中央银行对资本金的需求 Sims (2004)。

Stella (2005) 也提到，挪威、瑞典、冰岛都在其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持有大规模外汇储备，面临更多的汇率风险。例如，挪威中央银行的资产中国际储备和其他外汇资产占比达到 98.5% (2004 年底)。汇率的变化就会带来财务上的巨大不确定性。因此，挪威银行就必须想办法降低这种波动。比如，可以将其外汇证券组合中的一部分与政府的外币债务相匹配，或者将准备金设定目标为银行持有的本国证券的 5% 和其净外汇储备的 40%。

Ize (2005) 还针对持有相对较多国际储备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个

量化的框架，来评估在各种关键的政策和宏观经济变量确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对核心资本的需求。其中，国际储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例如，有三家中央银行（哥斯达黎加、智利、莫桑比克），它们都因为冲销资本流入、限制货币升值，持有大量的国际储备，再加上央行本身的运行成本很高，所以其核心资本应该是一个较大的正值。

除了全球化下货币错配问题可能更需要关注之外，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也带来了更多金融危机蔓延的可能性。就像在 2008—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的一样，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在进行救助的过程中就可能面对更多的资产损失 (Buiter, 2008)，这反过来影响中央



**尽管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在资本构成上有什么特征，央行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欧洲中央银行来讲，它是一家超国家的中央银行。**

欧元区成员国自己的中央银行，然后是联盟的欧洲中央银行。Luca Papi (2011) 考察了货币联盟的成员国中央银行，它们不用实施货币政策，但仍然有些作用，如监管和维护金融部门的稳定。这些职能仍然需要一定的财务自主来保证有效履行。正如 Vaez-Zadeh (1991) 指出的那样，如果公众认为央行的负资本金是其失败运行标志的话，就会损害其信誉，影响其运行。

尽管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在资本构成上有什么特征，央行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对于欧洲中央银行来讲，它是一家超国家 (Supranational) 的中央银行。对于每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其财政当局都会是中央银行的坚

强后盾，必要时给中央银行提供资金。而对于超国家的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直接站在其身后的财政当局。那么，欧洲中央银行怎样获得注资呢？欧盟 (European Community) 的预算太少 (只有欧元区 GDP 的 1% 多一点)，也没有随意利用税收和借款的权力。此外，目前不是所有的欧盟成员都是欧元区成员，也增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一个可行的方案是由各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分别按一定的比例来共同承担注资的责任 (Buiter, 2008)。

实际上，欧洲中央银行也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了损失出现时的安排：每年净利润的最多 20% 被转移至一个总储备基金 (A General Reserve Fund<sup>1</sup>)；一旦损失发生，就从该储备基金中获得补充。在需要时，还可以从成员国中央银行的利润中获得补充。

### 3. 实施美元化国家的中央银行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一些国家出现了货币替代现象，即外币在价值贮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替代本币，其中以美元替代本币最为显著。因此，一般我们称之为美元化 (Dollarization)，就是一国行政当局放弃本币采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居民也使用美元来行使本国货币之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及支付手段的功能。<sup>2</sup>

Luca Papi (2011) 也考察那些

银行适度资本金的规模。这也正是近年来一些文献甚至开始关注工业国像美国、英国、欧盟的中央银行的资本金问题的原因。因此，Sweidan (2011) 提出，在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重创、面临严重衰退的情形下，更要求中央银行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

### 2. 区域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区域货币联盟的发展。现实中，我们已经看到欧元区的成立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的运行。那么，在这样的区域货币联盟框架下，应该怎样认识中央银行的资本金问题呢？

其实这里有两个层面。首先是

1 由理事会 (The Governing Council) 来决定其最终数额。

2 当然，还有广义的美元化，就是一国行政当局放弃本币采用某种外币 (不限于美元) 作为法定货币。

进行了美元化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再发行货币，这一点类似于采用单一货币的货币联盟下的中央银行。因此，对这种情形下的分析也类似于上文对货币联盟成员国的分析。这时，可以把央行资本金看作以下几个变量的函数：所面对的风险水平和类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盈利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如果中央银行需要补充资本金，就无法通过货币发行来实现了。

## 五、结论

资本金是理解经济单位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如何理解中央银行这样一个独特机构的资本金问题呢？本文对这方面的文献上进行了观察、总结，对近年来有关中央银行资本金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获得一个有关央行资本金已有研究的基本概览，并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基础。

我们首先从如何理解央行资本金的基本性质入手，并引入了与资本金相关的一些经济概念。但是，文献中指出，一般的经济概念很难用在中央银行资本金上。那么，中央银行是否需要资本金呢？尽管资本金并不直接影响中央银行，但文献从实证和理论分析中得出了资本金存在的价值，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并自然引出中央银行的适量资本金或充足资本金的问题。因此，中央银行就可能面对资本金不足的状况，从而需要补充资本

**资本金是理解经济单位的一个核心概念，那么如何理解中央银行这样一个独特机构的资本金问题呢？本文对这方面的文献上进行了观察、总结，对近年来有关中央银行资本金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获得一个有关央行资本金已有研究的基本概览，并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基础。**

金。文献中分析了一些补充资本金的方法，如外部资金转移、内部发行货币等。而且，通过对资本金补充的分析又进一步证实了资本金的存在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维持物价稳定的价值。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央银行也面对一些新状况，文献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了两种情形，一种是全球化背景下央行的货币错配问题，这实质上是增加了央行损失的可能性；另外是货币联盟和美元化，这两种情形有相同之处，对于货币联盟中成员国和美元化国家的中央银行而言，它们都不再发行货币，但资本金的存在仍然对央行其他的管理职能有意义。

随着对资本金研究的文献不断积累，我们对央行资本金的理解也不断深入。可以说，对资本金性质和作用的理解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然而，

已有文献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资本金价值和数量确定标准，恐怕也不存在这样的标准。因此，不断从理论上证明资本金的价值、从数量上精化对资本金的研究，或者落实到某一具体国家中央银行的资本金量化研究，应该是该领域未来更为集中关注的。另外，我们这里的讨论并没有过多关注央行资本金损失的原因。而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再加上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变得更为重要。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国内学者集中于中央银行资本金的研究还比较少，但是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我国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等问题（熊奕，邹雨童，2010）。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显示出越来越高的货币错配程度，再加上人民币可能存在的未来升值空间以及有时需要进行的冲销操作，使人民银行面对损失的机会增多，对其资本金的考虑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有必要对资本金水平的变化进行关注，并相应地制定外汇储备增速、冲销操作等方面的具体计划，从而保证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效果，维持我国的物价稳定，为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当然，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具体研究还需要在不断吸收已有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展开。

## 主要参考文献

1. 熊奕、邹雨童：《央行财务实力与冲销操作可持续性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 Almeida, Alvaro, Maxwell J. Fry and Charles A. E. Goodhart, *Central Ban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bjectives, Activities, and Independence*, New York and Oxford: Routledge, 1996.
3. Bindseil, U., Manzanares, A., Weller, B.,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 Capital Revisited",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4, No. 392.
4. Buiter, Willem, "Can Central Banks Go Broke?", *Policy Insight*, 2008, No.24.
5. Cargill, Thomas F., "Central Bank Capital, Financial Strength, and the Bank of Japan", FRBSF Economic Letter, No. 2006-11, May 19.
6. Cukierman, A., "Central Bank Finances and Independence – How Much Capital Should a Central Bank Have?", *The Capital Needs of Central Banks*, S. Milton and P. Sinclair (eds.), Routledge Publishing House, 2011.
7. Dalton J. and Dziobek C., "Central Bank Losses and Experiences in Selecte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2005.
8. Ernhagen, T., Vesterlund, M. and Viotti, S., "How Much Equity Does a Central Bank Need?", *Sveriges Riksbank Economic Review*, 2002.
9. Frait, J.,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and Negative Central Bank Capital: Is There a Proble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xpert Forum on Central Bank Finances and Impact on Independence, 2005.
10. Fukui, T., "Challenges for Monetary Policy in Japan", Speech at the Spring Meeting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http://www.boj.or.jp/en/type/press/koen/ko0306a.htm#02c>.
11. Hawkins, James, "Central Bank Balance Sheets and Fiscal Operations", *BIS Papers*, 2004, No. 20.
12. Ize, Alain., "Capitalizing Central Banks: A Net Worth Approach", *IMF Staff Papers*, 2005, Vol.52, No.2.
13. Jeanne, O. and Svensson, L.E.O, "Credible Commitment to Optimal Escape from a Liquidity Trap: The Role of the Balance Sheet of an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 2005. <http://www.princeton.edu/svensson/papers/js.pdf> (accessed March 2009).
14. Kluh, U. and Stella, P., "Central Bank Financial Strength and Policy Performance: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IMF Working Paper*, 2008.
15. Luca Papi, "Central Bank Capital adequacy for Central Banks with or without a Monetary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49.
16. Martina Horakova, "Central Bank Capital Levels: Do They Matter and What Can Be Done?", *Central Banking Journal*, 24 May 2011.
17. Stella, P., "Do Central Banks Need Capital?", *IMF Working Paper*, 1997, No.97/83.
18. "Central Bank Financial Strength, Transparency, and Policy Credibility", *IMF Working Paper*, 2002.
19. "Why Central Banks Need Financial Strength", *Central Banking*, 2003, Vol. 14.
20. Stella, P., "Central Bank Financial Strength, Transparency and Policy Credibility", *IMF Staff Papers*, 2005, Vol.52, No.2, 335-365.
21. Sullivan, K. Profits, "Dividends and Capital--Consider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speech given at the LEG Seminar for Central Bank Lawyers; in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Central Banks*, 2003.
22. Sweidan, O. D., "Central Bank Loss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01281: P29-42.
23. Ueda, Kazuo., "The Role of Capital for Central Banks "Based on a speech at the Fall Meeting of the Japan Society of Monetary Economics, on October 25, 2003.
24. Vaez-Zadeh, Reza, "Implications and Remedies of Central Bank Losses, in Patrick Downes and Reza Vaez-Zadeh (eds)", *The Evolving Role of Central Banks*, Washington, D.C., 1991, pp. 69-92.

# 《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sup>1</sup>

田小惠 /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书名：《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

主编：田小惠（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2月

战败赔偿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外交问题。《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从历史角度分析了大国的德国赔偿政策的制定、发展及合作与斗争，并与二战后日本战败赔偿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

本书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探讨了战败赔偿的法律基础。国际法是解决战败赔偿的法律依据，同时处理战败赔偿问题的实践

也在不断推动国际法的发展与完善，这是一个辩证的、互动的过程。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雅尔塔会议前美英苏三大国就德国赔偿问题的政府内讨论。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关于德国战败赔偿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展开的，而早在1939年英国政府内就有了相关的讨论和提案。美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多边主义原则”在这一时期也得以确立，而苏联对德国赔偿问题的考虑主要出于战后经济重建

<sup>1</sup> 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学术著作资助出版项目《德国战败赔偿政策研究（1939-1949）——兼与日本赔偿政策的比较》的著作简介。

的需要以及保证西部安全的考虑。第三部分进一步分析了从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期间，三大国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合作与斗争。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是二战末期三大国之间的两次重要会晤，正是在这两次会议上，三巨头就德国战败处理问题进行了正面磋商，也正是在此期间盟国间开始从合作走向对抗，反映在赔偿问题上“分区赔偿”原则的确立是三大国在德国经济问题上分裂的端倪。波茨坦会议后，美英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增多并且愈加表面化，战时共同敌人的丧失，使得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斗争开始逐渐显现。美英和苏联之间的摩擦不断增多，苏联对东欧的影响，法国、意大利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使美英惴惴不安，赔偿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第四部分论述了“赔偿与工业水平计划”的签订及执行情况。美英苏在1946年3月签订该计划后不久就在赔偿问题上分道扬镳了。随着“遏制”战略的出台，美国在对苏政策上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德政策的制定，美英通过对工业水平计划的多次修改，将拆迁工厂的数量一再削减，西占区（西德）被逐步纳入“欧洲复兴计划”的框架内而摆脱了赔偿的责任，而东占区则在苏联的主导下执行大规模拆迁政策，美英和苏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实现了彻底的分立。第五部分就德日的战败赔偿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四大大国对德国赔偿政策的制定

及执行是成功的，这种战争罪责的罚金有利于德国对战争的发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认识，而与此不同的是，正是由于日本在战后逃避了大批战争赔偿，并将赔偿作为发展经济的投资，使得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缺乏一种正确的对于战争的悔罪态度。

基于上述研究，本书得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第一，美英苏在赔偿政策上的斗争与分裂实质上是两种经济制度的争夺与对抗。第二，美英苏在德国赔偿政策上的分裂既是促成冷战的若干因素之一，也是由战后初期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的形势所决定的，两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第三，二战后德国赔偿问题上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免了德国利用赔偿问题中大国的外交斗争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同时赔偿的支付也有利于德国人对于战争罪行的供认不讳。

本书的目的是填补国内在战后德国战败赔偿问题研究上的空白。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关于日本的战败赔偿问题，而对于战后德国赔偿问题问津者不多。而本书试图通过在占有大量史料及英文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来分析德国赔偿政策制定过程中大国间复杂的外交斗争，从而揭示德国赔偿问题与冷战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书还通过对比德日在对战争罪责的认错态度和赔偿政策的执行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



亚洲研究动态  
Asia Research Network

主编 郭婍庆 赵宗锋

编辑 王惠英

设计 大达期刊设计公司

E-mail: [icwar@bfsu.edu.cn](mailto:icwar@bfsu.edu.cn)

电话: 86-10-88813845

传真: 86-10-88813842

地址: 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 100089